

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

陈 杰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

石荣传 (中国海洋大学艺术系)

摘要: 作为两晋时期典型而精美的青瓷器之一, 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和名称众说纷纭。参考狮形器的出土状况, 从实用性、经济性、美观性等因素考虑, 带背筒狮形器应该是文房用具而非烛台、酒器, 并确定它的名称应该叫水注而非水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带背筒象生器的定名也应为水注。

关键词: 狮形器; 晋朝; 定名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8)03-074-05

两晋墓中出土狮形(或称辟邪形)带背筒青瓷器甚多, 对于其用途和名称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有的称之为水注, 有的称之为烛台, 还有的称之为水盂、插器、酒尊、长明灯等等^[1], 不一而足。有的则因其用途不清楚, 干脆以其形状称之为狮子、狮形器或辟邪形器, 忽略了其带有功能性的名称(本文在没有讨论其用途之前, 也姑且称之为狮形器)。

对于在两晋时期精美而典型的青瓷器之一, 弄清其功能用途, 还其本来面目是重要的, 本文不揣浅陋, 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以就教于方家。

一、狮形带背筒青瓷器之考古发现

目前仅就笔者所见考古出土和部分馆藏的狮形带背筒器列表如下:

以上狮形器除一件出土于水井内以外, 其余均出土于墓葬。

此外, 国内一些博物馆和文博机构也收藏有此类狮形器, 如故宫博物院^[2]、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3]以及河北邢台、安徽宣城、江苏扬州、浙江绍兴、萧山、义乌、瑞安、台州、奉化、余杭江南水乡博物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均有收藏。

二、产地、流行地域及流行时代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 这些狮形器的出土地明显有两个中心分布区。

可以明确狮形器的出土地有45处, 而以南京最为集中, 达9处。其周围的常熟、仪征、句容、武进、溧水、扬州、丹徒有8处, 南京周边已达17处之多。另一个中心是宁绍平原及周边地区, 杭州、余杭、绍兴、余姚、永嘉、上虞、

温州有12处。两处相加达29处, 占64%。宁绍平原分布更为广泛, 除上述考古出土的以外, 周边的义乌、萧山、瑞安、台州、奉化、余杭、宁波天一阁等处博物馆均收藏有狮形器, 只是资料未见发表。

除了这两个中心以外, 山东地区也算狮形器出土较多的地区之一了, 临沂、邹城、淄博、新泰都有发现, 而且临沂除了洗砚池M1外, 临沂湖台遗址也出土有3件西晋兽形辟邪水注^[4], 这是除中心区以外发现狮形器最多的地区。

其他地区分布较为零散, 但基本上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如安徽广德、宣城、合肥、马鞍山、霍邱、广东广州、肇庆、湖南益阳、江西九江、湖北鄂城等, 江北仅见于河南新郑和洛阳。

狮形器的出土为什么会集中于南京地区和宁绍平原呢? 后一个问题较容易解释, 因为位于宁绍平原的越窑是此类狮形器的产地, 在浙江上虞皂李湖窑址^[5]、梁湖镇老鼠山窑址和多柱山窑址^[6]、晾网山窑址^[7]、绍兴钱清镇九岩窑址^[8]、余杭区瓶窑镇长命石山下窑址均出有青瓷狮形器及残片, 上虞皂李湖公社宋家山晋代青瓷窑址出土有狮形器陶模, 而在其他地区窑址则无所见。从宁绍平原周边出土及馆藏狮形器的数量之多, 也可以窥见一二。

南京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的狮形器呢? 我们现在能明确的是: 南京是东晋都城建康的所在地。西晋末年, 众多士族为躲避战乱南迁, 集于南京附近。琅琊王氏、颜氏与谢氏、高氏、温氏等高门大族相继来到南京。这些狮形器和这些南迁士族是否有关系呢?

除两个中心分布区以外, 山东地区也是出土较多狮形器的地区之一, 而山东地区不仅是东晋皇室发祥地(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登基之前为琅琊王, 治今山东临沂), 也是魏晋大族琅琊王氏

附表：考古出土的狮形带背筒器

出土地	文中名称及用途	时代	尺寸(厘米)	文中形状描述	墓葬状况及伴出器物	出处
江苏南京	辟邪插器	太康 7 年 (286)			墓葬被盗。	2
浙江余姚	狮形烛台	太康 8 年 (287)	长 12、高 7.4	蹲伏,背有圆管通腹部	伴出水盂、三足砚	3
江苏句容	狮形插座	元康 4 年 (294)	长 12.8、残高 8.6,筒径 1.2	人骑卧狮状,狮右肩附管状背筒,背残存双腿	墓葬被扰。伴出青瓷砚	4
江苏江宁	狮形插座(4 烛台)	上限为西晋元康 7 年 (297)	长 13.2~13.5,筒径 2.5	蹲伏状,背上有一圆管,中有插孔	被盗。与水盂并排放在一起	5
江苏江宁	青瓷狮	元康 9 年 (299)	长 18、高 12	蹲伏状,负背筒,腹空	出土情况不明	6
山东邹城	狮形水注	永康 2 年 (301)	长 13.5,筒径 2.6	蹲伏,背有圆柱形直口	盗。伴出石砚板 4	7
江苏南京	狮形器	永宁 2 年 (302)	长 19、高 12.5,筒径 3	蹲伏状,腹部刻飞翼,脊上有圆管,背筒前倾	出于祭台下右前角	8
浙江杭州	狮形插座	太安 2 年 (303)			出土情况不明	9
江苏常熟	辟邪烛座	永嘉 6 年 (312)		蹲伏状	伴出三足砚、水盂	
浙江余杭	狮形烛台	建兴 3 年 (315)	长 16、高 11.2	蹲伏状,背负圆筒	出土情况不明	10
广东肇庆	狮形器	泰宁 3 年 (325)	长 13.5、高 11.5	蹲伏,孔内有圆锥拴插	盗。伴出青瓷砚足	11
安徽马鞍山	狮形烛台	咸和 7 年 (332)		蹲伏状,背上有一圆管	墓葬情况不详	12
福建霞浦	狮形插器	永和 2 年 (346)		蹲伏状	扰。伴出水盂	
浙江永嘉	虎形高背筒灯台	永和 10 年 (354)	长 12、高 30.1,筒径 3.7	卧虎状,背负一竹节纹高筒	出土情况不明	13
山东淄博	狮形水盂	太和 17 年 (493)	长 12.5,筒径 2	蹲伏状,口置背部	墓室被扰	14
江苏南京	狮形注	东吴			破坏,情况不明	15
江苏南京	狮形注	吴末晋初		蹲伏状	盗。伴出带盖小盂	16
浙江绍兴	青瓷烛台	西晋中期或偏早	长 10.5、高 6.5,筒径 1.2	蹲伏状,身饰羽翼纹,背部出一管,直通腹部	扰。伴出青瓷砚、水盂	17
湖南益阳	狮形插座	西晋晚期	长 13、高 8.8	蹲伏状,背部有圆形管	盗。伴出盂、砚板	18
山东临沂	青瓷胡人骑狮水注	西晋晚期	长 20.5、高 27.1	胡人骑卧狮状,胡人头戴中空高筒帽	墓葬保存完整。与瓷砚同出西室	19
浙江绍兴	狮形烛台	西晋	长 13.5,筒径 2	蹲伏,背置小管通腹部	盗扰。伴出三足砚	20
安徽广德	狮形插座	西晋	长 16,筒径 2.2	蹲伏状,背上有一圆管	伴出水盂	21
江苏南京	狮形插器	西晋	长 10.9,筒径 1.4	蹲伏状,背部有一圆孔	出于古水井内	22
江苏仪征	狮子	西晋	长 12,筒径 2.2	蹲伏状,背上有圆管	扰。伴出有石黛板	23
江苏武进	狮形水注	西晋	长 12.2,筒径 2.7	蹲伏状,身负背筒	残墓,情况不明	
浙江绍兴	青瓷烛台	西晋	通长 11、高 8	蹲伏状。背置管状插口	出土情况不明	24
湖北鄂城	狮形插座	西晋	长 12.2,高 8.1	蹲伏状,背有细管插筒	祭台后面左侧	25
江苏南京	辟邪水注	西晋	长 9.7、高 7.0	蹲伏状。背上有圆形流	伴出残青石板	26
河南洛阳	狮形盂	西晋	长 12、高 3	蹲伏。背有喇叭形注口	出土情况不详	27
浙江绍兴	辟邪水注	西晋	长 11、高 8	立姿。背置管状插口	出土情况不明	
山东新泰	狮形烛台	西晋	长 17.2、高 26	蹲伏。背有高管通腹部	出土情况不明	28
江苏溧水	辟邪水注	西晋	长 14、高 9.1	蹲伏状,负筒形注水口	出土情况不明	29
浙江温州	辟邪水注	西晋	长 12.5、宽 6	蹲伏状	出土情况不明	30
江苏扬州	辟邪水注	西晋	长 13.1,筒径 2.6	蹲伏状,身负背筒	出土情况不明	31
安徽合肥	青瓷辟邪	西晋	长 12.2、高 7.3	蹲伏状,背上有管状流	出土情况不明	
浙江杭州	辟邪烛台	西晋	长 16.5、高 11.9	蹲伏状,狮背有一竖孔	出土情况不明	32
江苏丹徒	狮形烛台	西晋	长 12.5、高 9.3	蹲伏状,背有管状小口	出土情况不明	
江苏仪征	狮形插器	西晋末	长 12.8、高 8.8	蹲伏状,背有圆形插孔	出土时置砚台上	33

江苏南京	辟邪形器	东晋早期	长 15.5、高 11	蹲伏状,背部有小圆管	扰。伴出陶砚	34
江西九江	辟邪水注	东晋中期	长 11.4、高 7	蹲伏状,背筒及四足残	伴出水盂	35
安徽马鞍山	狮形插座	东晋		蹲伏状	伴出瓷砚	36
河南新郑	青瓷狮尊	东晋	长 12、高 7.5	蹲伏状,背上有一圆孔	出土情况不明	37
广东广州	狮形水注	晋	长 11.3、高 7.5	蹲伏状,背上有圆形突起的流	完整。出于石砚左侧,右边有墨	38
浙江杭州	辟邪水注	晋		蹲伏状	出土情况不明	39
安徽霍邱	青瓷水注	晋	长 13.5、筒径 2.4	蹲伏,背有圆柱形直口	出土情况不明	40

的故乡,王氏家族则更是出了书圣王羲之及王献之父子,王氏一门书风极盛,王导、王恬、王洽、王邵、王荟、王珣、王珉、王廋、王敦、王邃、王虞、王旷、王羲之、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献之、王淳之均善书。这与狮形器是否有关呢?这一点等到谈及狮形器的用途时再作详细讨论。

狮形器的流行时代一般认为是两晋时期,这从纪年材料上也可以得到证实。从上表中可知,目前已公开发表的出土有狮形器的纪年墓葬 15 座,其中西晋 10 座,东晋 4 座,年代最早的是江苏南京西晋太康七年(286)画像砖墓,最晚的是浙江永嘉县雨伞寺 M8 东晋永和十年(354)墓,也就是绝大多数集中在 68 年之间。北魏墓仅 1 座,为山东淄博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崔氏墓,此墓与前述最晚的雨伞寺 M8 时间跨度达 139 年。我们认为,此狮形器应当前朝遗留下来的,而非当时生产并流通的。如前所述,狮形器的产地为浙江宁绍平原,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在其产地,这一百多年来狮形器还在生产,也没有发现其在其产地周边有出土和流通,那么一百多年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淄博怎么会出土有狮形器?我们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它并非当时生产流通的,而为前朝遗物。

福建闽侯关口桥头山 M4 西晋永嘉五年(311)出土青瓷羊形座^[9],与狮形器相比,除了一为羊形、一为狮形之外,器物大小、轮廓及背筒位置均相似,应为同时代产物,也为狮形器的流行年代提供了一个佐证。

从以上材料我们应该可以断定,狮形器的流行时间在西晋到东晋前期,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东晋永和十年(354)以后的墓葬出土有狮形器。不过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神人狮子”条记载有东晋太元二年(377)胡人骑狮器^[10],与山东临沂洗砚池 M1 和故宫博物院藏胡人骑狮器大致相类。即使如此,其下限也不过东晋中期。即便我们不能断定东晋中期以后没有此类狮形器的出现,但其流行年代当在西晋中期至东晋中期当无问题。东晋晚期以后,随着象生器物的衰落,狮形器也逐渐趋于消亡。

三、狮形器的用途

综合来说,关于狮形器用途的说法大致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盛物的,如水注、水盂、酒尊;一类是插物的,或烛台、插器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陶瓷史》的说法,其中有一段话论及狮形器的用途:“狮形烛台过去被定为‘水注’,认为是盛水的文具。它的成型方法与当时盛行的蛙形水盂和敛口扁圆腹水盂完全不同,后者是拉坯成型,有一个器壁薄而光滑的扁圆形腹以贮水。辟邪烛台则用模印法对接成型,器体厚重,内壁凹凸不平,有管状口而无流,不像盛水的样子,也与砚、笔筒等文具不相匹配。所以从实用、形态和体重来看,都应以用于插烛照明为宜”^[11]。它主要从成型方法来看,认为“不像盛水的样子”,而“应以用于插烛照明为宜”。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是否妥当,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器物的成型方法首先要看器形,而不是看它的功能,比如同是油灯,碗盘形油灯可以拉坯成型,如是兽形灯,则无法拉坯成型,但不能因为无法拉坯成型则说它不是油灯。其次,其“内壁凹凸不平,有管状口而无流,不像盛水的样子”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盛水的器具,其主要功能在于贮水,与内壁光滑与否似无关系,况且其成型方法及造型决定了其内壁不可能象拉坯成型那般光滑和平整。再者,所谓“有管状口而无流,不像盛水的样子”,而当时有一些器物即属有管状口而无流,如蛙盂,有些管状口尚不如狮形器的口大,有些狮形器的管状口达 3 厘米,甚至达 3.7 厘米者,比现在的矿泉水瓶口都大,矿泉水瓶亦属“有管状口而无流”,是否也“不像盛水的样子”?显然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无法以此来否定狮形器盛水的功能。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狮形器是否可以作为烛台或插器呢?

作为一件生活用品,要满足三个方面的条件,即实用、经济、美观。其中实用是第一位的。狮形器如果作为烛台,其背筒与器腹之间应该是不能相通的,避免蜡烛细了或燃尽落入腹中;而且尽可以把圆管做粗,蜡烛可以用烛泪粘住烛底,使之固定燃烧。如 1975 年浙江绍兴发现一件南朝狮形烛台,狮背上有方座,长方横梁上有三个圆形管,与底部不通,可以插烛。但现在所发现的狮形背筒器则是背筒与狮腹是相通的,无法粘住烛底。而且狮形器背筒口径也大小不一,上表中背筒口径明确的 14 件狮形器,就

有10种尺寸,孔径从1.2到3.7厘米不等,不知怎样解决背筒口径与蜡烛底径之间的矛盾。因为背筒口径是固定的,蜡烛稍粗则插不进去,蜡烛稍细则会落入腹中。即便蜡烛正好与背筒口径相合,可以紧紧卡在管中,但蜡烛烧完后,其残余或卡在管中,或落入腹中,很难取出。而且在考古工作中从未发现狮形器中有残烛或烛泪。

也有人据此认为此类狮形器仅是明器,所以没有使用痕迹。一般而言,即便是明器,作为烛台来说,在下葬时也应该点燃,如灯盏,而不仅仅是放入墓中。另外,江苏南京交通厅工地古代水井内也出现青瓷狮形器,如是明器,为何会出现在井中,这是无法说通的。而且前述山东淄博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崔氏墓也出土有狮形器,没有人会把明器放在家中流传一百多年,至北魏才下葬,这也于理不合。这种流传只能证明一点,它不可能只是作为明器出现,而应该是一种生活用器。

如果仅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如作烛台使用,不如做成实心,在背上置一小短筒,既不影响美观,且无落入腹中之虞,即使烛细,也可燃蜡于筒内以烛液将烛粘住,岂不比做成空心的要实用很多?另外在上表中,有4件狮形器有高背筒,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胡人骑狮器,胡人身体加空帽筒也构成高背筒,这种高背筒狮形器如用以插烛或插物,则会使重心升高,使本就空心而显得虚飘的狮形器更不稳固。

再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狮形器在两晋也是一种常见的器物,而且在窑址中,它也是与其他日用青瓷在一起烧制,可知它并不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奢侈品,并不存在不考虑成本、只追求美观的可能。它也一样要在市场上流通,在市场上流通是讲求成本的。空心的狮形器是先模制、后合范制成的,相对于做一只既可捏制也可模制的实心狮子,显然费工费力,单位时间内成本肯定比实心的狮形器要高,在经济上并不划算。

美观性则是要在满足实用性和经济性以后才会考虑的因素。单纯从美观的角度说,狮形器的实心 and 空心,在外观上是一样美观的。并不会因为实心而不美观。相对于空心的狮形器来说,实心狮形器重心稳定,省工省力,既经济又实用,还不影响美观,那我们实在找不出狮形器非要用空心的理由(插物与插烛的道理相同)。

那只有一个解释,它不是用来插物的。

我们再从其他方面来看。河南洛阳涧西晋墓出土的狮形器,其“背部有一喇叭形注口”,喇叭形注口如何用来插烛或插物?但用来作水器或酒器却很合适,如觚、觥、玉壶春瓶都是喇叭口。

而且安徽合肥、浙江上虞皂李湖窑址出土以及河南新郑采集的狮形器其背筒均显著前倾,显然也不适合插物。

广东省肇庆市坪石岗出土的青瓷狮形器背孔内有圆锥形堵塞,如为文房之用,很容易理解,

故宫博物院藏汉玉卧羊形砚滴^[12]、江苏扬州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玉飞熊砚滴^[13]均有塞,而如为插烛或插物,要堵塞何用?

江苏南京交通厅工地古代水井内出现青瓷狮形器,也从侧面说明了其用途可能与水有关。如作为文房用具,沾有墨渍,拿到井台上洗,或注水,不慎落入井中,尚有可解,如作为插器、烛台如何会拿到井边,又如何掉入井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种青瓷狮形器不是作为插物或插烛所用的插座或烛台,而应该是一种盛放液体的水器或酒器。

那它究竟是水器还是酒器呢?在附表中,除了水井和墓葬情况不明以外,其余23处墓葬均有伴出器物出土。尽管这些墓葬大多被盗,仍然有12座出土有砚台或砚板,5座出水盂,3座墓既有水盂也有砚,只有3座墓没有出土文房用具,而且均被盗,墓中是否有砚、盂等,不得而知。而在保存完整的墓葬中,狮形器与文房用具的关系则十分紧密,如广州市西北郊桂花岗M4出土的狮形器置于祭台中间石砚左侧,右边有一团墨;江苏仪征县胥浦乡M90狮形器出土时则直接置于砚台上;山东临沂洗砚池M1保存完整,青瓷胡人骑狮水注与瓷砚同出于西室。这些都说明了狮形器与文房用具的亲密关系。

在这些狮形器中,有高背筒的有5件,分别出于山东新泰市果都镇后高村、浙江永嘉县雨伞寺M8、山东临沂洗砚池M1、江苏句容孙西村、故宫博物院旧藏,其中山东新泰(高26厘米)、浙江永嘉(高30.1厘米)这两件是高背筒状,山东临沂洗砚池M1(高27.1厘米)、江苏句容孙西村(残高8.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品(高28厘米)均是胡人骑狮状。在这5件高背筒狮形器中,故宫博物院是馆藏,新泰和永嘉出土情况不详,而山东临沂、江苏句容两墓均伴出有青瓷砚。

这类胡人骑狮器在文献中也有记录,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神人狮子”条记载:“松江之横云山,古冢累累然,世传以为晋陆氏所藏。山人封生,业盗冢,至正甲辰春(至正二十四年,即公元1364年),发一冢,冢砖上有‘太元二年(377年)造’五字。按太元,东晋武帝时也……冢中得古铜勺、壶、洗、尊、鼎、杂器物二百余件。内一水滴,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骑狮子背。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人之脑心为窍,以安吸子。吸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席帽胡人……约长五寸,高四寸许,诚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过生,生出以售,捐钱五十缗买之归……昔鲜于困学公尝畜一水滴,正与士安者大同小异,相承曰蛮人狮子,爱之未尝去手”^[14]。文中称之为“蛮人狮子”,而且对其出土时间、地点、形状描述均甚为详细,与前述胡人骑狮器几无二致。并且文中也指出,此器为“水滴”,即砚滴。这至少也说明了当时这种胡人骑狮器的确可以当作砚滴使用。

也有人认为狮形器作为文房用具有些太笨重了,而且是狮形,“与砚、笔筒等文具不相匹配”,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上表中有尺寸的狮形器有36件,长度在9.7至20.5厘米之间不等,但其中长度在15厘米以下的有28件,约占78%,超过18厘米的仅有3件,而且1件是胡人骑狮器。大部分狮形器大仅盈握,做文房用具并无笨重之感。要说匹配,在出土的两晋资料中没有发现笔筒,就砚台来说吧,汉代的砚台就有盘龙砚、龟形砚、蹲蛙熊足砚以及蟾形铜砚盒,都是动物造型,而且文房常用的水盂和砚滴也有蛙形、兔形、羊形、熊形等造型,与狮形器正好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狮形器应该是一种用来盛水的文房用具。

狮形器的流行也与两晋书风之盛密切相关。晋代是书法的鼎盛时期,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擅长书法。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列晋元帝书为下之上品,论曰:“动成楷则,殆逼前良,见希后彦。”《淳化阁法帖》卷一尚存有晋元帝草书二帖。东晋时王、谢、郗、庾诸姓望族并出,门第书风,均为时之楷模,如唐窦泉《述书赋》上所云:“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为世人所称道,除王氏一门外,其他三家代表人物有谢尚、谢奕、谢安、谢万、郗鉴、郗愔、郗昙、郗超、郗俭之、郗恢、庾亮、庾翼、庾怿、庾准等等。其他著名书家尚有卫铄(卫夫人)及竹林七贤诸人。书风盛处,文房用具自然流行。南京、山东等处多见狮形器盖由于此。

四、狮形器的名称

狮形器既然是一种盛水的文房用具,那究竟是水注、水盂或是砚滴呢?

先看水注与砚滴的关系。砚滴,又名水滴、书滴、滴子,《说文解字注》称“滴,水注也”^[15]。《辞源》亦持此说,即认为砚滴即水注。文献中最早提到水注的是宋龙大渊的《古玉图谱》^[16],书中记载的古玉水注有:卧羊水注、莲房水注、卧瓜水注、蟾蜍水注、玄武水注和辟邪水注。故宫博物院藏汉玉卧羊形砚滴即应是此处所指卧羊水注,而玄武水注当为《南村辍耕录》“古器”条所提“龟蛇砚滴”之属。蟾蜍水注则是古人常称的“蟾滴”,《西京杂记》载云:“晋灵公冢……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为书滴”^[17]。宋人何薳在《春渚纪闻》中也载有:“古铜蟾蜍,章申公研滴也”^[18]。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器具》“水注”条中称:“水注之古铜玉者,俱有辟邪、蟾蜍、天鸡……诸式滴子,一合者为佳”^[19]。其中也将水注称之为“滴子”,亦有辟邪、蟾蜍之形。由此可见,古时水注亦为砚滴,其区分不甚明显。南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曾谈到水盂:“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型如

桶,可容今一合,于右军研水盂,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砚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其尽复磨,故有水盂”^[20]。据此,水盂的作用也是“贮水以添砚池”。那它与水注有什么区别呢?《辞源》“水注”条载:“文具,用以注水于砚。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水丞”^[21]。水丞,又叫水中丞,为“水盂之小者”,“……其口敛而加小者,谓之水丞,则盂之属也”(《陶雅》卷上九),它与水注的区别就在于有嘴无嘴。

综上,这种带有圆筒形注水口(背筒)的狮形器应称之为水注,而不是水盂。在背部有着同样圆筒形注水口的羊形器、蛙形器、兔形器、熊形器、龟形器都应是文房所用的水注,或称砚滴。蛙形水盂则应指那种无背筒、鼓腹敛口的蛙形器,即《陶雅》所称“水丞之高者,锐上而丰下,俗谓之田鸡簪”者。

参考文献:

- [1] 田恺:《西晋狮形带孔青瓷器的功用》,《装饰》2003年5期。
- [2]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 [3] 杨培钧:《陶瓷器——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图版21,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 [4] 管恩洁、杨西锴:《临沂市博物馆文物综述》,《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2期53页。
- [5] 章金焕:《浙江上虞皂李湖古窑址调查》,《南方文物》2002年1期19-25页。
- [6] 章金焕:《浙江上虞皂李湖古窑址调查》,《南方文物》2002年1期19-25页。
- [7] 任桂全主编:《绍兴市志》第3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8] 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10月版。
- [9] 黄汉杰:《福建闽侯关口桥头山发现古墓》,《考古》1965年第8期427页。
- [10]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P28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11] 中国硅酸盐协会:《中国陶瓷史》160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 [12] 周南泉:《玉器(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
- [13]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甘泉老虎墩汉墓》,《文物》1991年10期。
- [14]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28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1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16] (宋)龙大渊:《古玉图谱》,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 [17]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
- [18] (宋)何薳著:《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9] (明)文震亨:《长物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
- [20] (南宋)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1928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石印本。
- [21] 陆尔奎等编纂:《辞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